

DOI: 10.13484/j.cnki.ndxbzsb.20210107

从雅各布·布克哈特到彼得·伯克

——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史研究新突破

崔瑾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文艺复兴是14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长期以来笼罩在神学阴影下的欧洲带来了文明的曙光。作为这场运动的首发地和重镇的意大利诞生了享誉世界的文化奇迹,故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史的研究长期以来是文艺复兴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内容。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和英国学者彼得·伯克无疑是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史的两重要代表人物,其代表作分别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彼得·伯克加深了学界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史学的理解,弥补了布克哈特有关文艺复兴文化史研究的不足,从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等方面实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史研究的新突破。

关键词: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社会;互动

分类号: K54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18(2021)01-0043-07

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97)是19世纪瑞士文化史大家,其代表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突破了传统历史学的叙事模式,将研究的视域扩展至人类社会的思想文化层面,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开辟了广阔天地,影响深远。百年之后,作为新文化史学的倡导者,当代英国文化史学者彼得·伯克采用独特的社会学方法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史,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新角度。其代表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勇于打破旧理论,运用“计量史学”等新方法,将意大利文艺复兴史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从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到伯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不仅说明了近百年间文化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进展和创新,同时也体现了新文化史观对旧有的传统文化史学理论的挑战。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布克哈特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史学术思想的研究已涌现出一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

布克哈特人文主义思想和相关政治理论的剖析^①;二是对布克哈特文化史观的介绍和理解^②;三是对布克哈特有关文艺复兴运动认识的考察^③。彼得·伯克作为当代史学家和新文化史学的代表人物,先后撰写了一系列阐述其文化史思想的著作,研究已有一定规模。国内学界对伯克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内容多为翻译、介绍其理论思想。^④作为研究文艺复兴文化史的两代表人物,学术界将二者的思想及内容进行全面比较研究的考察仍有待丰富和完善。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从二者研究思路、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社会背景的认识、研究手段和文艺复兴运动社会思想认识这四个方面进行比较,来探求文艺复兴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

一、研究理念的飞跃——从传统文化史观到新文化史观

雅各布·布克哈特出生于19世纪瑞士的巴塞尔市,家庭条件优越,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多次前往意大利旅行,在此期间加深了对意大利社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21XNH094)

收稿日期:2020-08-28

作者简介:崔瑾,男,内蒙古乌海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会和文艺复兴的理解,并深受“文化史之父”伏尔泰的影响。伏尔泰的《风俗论》在文化史研究中被认为是一部举足轻重的著作。他在书中阐明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记录了过往史学家较易忽视的人类历史中的文化成就、风俗习惯、艺术娱乐和社会生活等因素。在其影响下,布克哈特创作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突出体现了13世纪至16世纪中期的意大利社会面貌。正如书中引言所提到的那样“写文化史的一个最严重的困难就是为了无论如何要使人理解而必须把伟大的知识发展过程分成许多单一的,和往往近似武断的范畴。”^{[1][2]}因此他改变了传统史学按照年代写作的方法,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视作一个连续和继承的过程。除此之外布克哈特认为,在文化传播和继承的过程中,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可以从政治、社会、文学、道德观念甚至社交礼仪中寻找蛛丝马迹。因而他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建设分为六个部分,并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体制也进行了一定的介绍,立场鲜明地提出:文艺复兴不单单是古典文化的再生,也是一种欧洲文化的自我创新和突破,这种创新体现在意大利人通过勇于开拓的精神和对科学的追求发现了新的世界,发现了自我,反映了“个人主义是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基础”,进而打破了宗教神学对文化的枷锁和束缚。在研究思路,布克哈特试图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视作人类社会活动的“有机体”,即由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等多方面因素所相结合而成的一个系统。在他看来,“文化”更像是人类诸多社会活动的表征,是人类历史的重要载体和反映。他主张史学家通过对人类社会在某一时期所产生的物质、精神产品进行提炼和分析概括,就可以较好地还原历史原貌。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观”将人类社会的文化看作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吐故纳新。因为“社会并不是一个由事件组成的线性系列,而是一个高度复杂和相互作用的系统,任何因素的某种变化都可能会对其他因素造成多重的影响”^{[2][13]}。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历史观所关注的就不是行动、事件或那些看上去促成这些事件的伟人,而是这些事件发生时的文化背景”^{[2][11]}。

相对于布克哈特,彼得·伯克的研究则更加深入。他立足文化与社会的互动,深入探究二者

的内在联系。其撰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之际,正值“新史学”运动在欧美如火如荼地开展,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正在逐渐扩大,同时“计量史学”的研究思想和理念在史学界也风靡一时。伯克博采众家之长,采用由中心(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文学、音乐及思想)向外拓展的研究思路,探究文化创新的体制,更加注重探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包括绘画、建筑、文学、雕塑、音乐等)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这恰恰是布克哈特所忽视的部分。“艺术与其时代的历史密切相关,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如何具体阐述这种关系。在这里我们的目标是避免早期研究文艺复兴的两种方法的弱点……第一种是‘Geistesgeschichte’(精神史)。第二种是历史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3][4]}布克哈特所采用的即是第一种精神史的思路,这种研究理念十分强调“时代精神”的作用,认为“时代精神”体现于所有活动中,包括艺术创作及哲学思考。与历史唯物主义立足现实生活、强调冲突、强调经济与社会基础决定“文化”(这里的文化指的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达)的观点不同,秉持精神史研究理念的学者们似乎更多地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他们通常会从思想而非日常生活着手,强调一致性而忽视文化与社会的冲突,并认为不同的社会活动间仅存在着某种模糊的联系。伯克既没有沿用布克哈特的路径,也没有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而是尝试使用了一种类似法国“年鉴学派”的模式,他“将自己描述为年鉴的‘同路人’,一个受到启发的局外人”^{[4][5]}。正如其在书中所提到的那样“本书对比较史和心态史的关切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们为榜样,与他们的研究一样,本书的目标也是一部开放的社会史。他们探索文化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但不假定想象领域(即文化)的一切由社会和经济力量决定。”^{[3][5]}相较于布克哈特,伯克更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艺术具有多样性和长时期发展的特征,必须通过多个维度来进行考察。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有所契合,因此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史的研究更加完整。此外,伯克还注重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经济及地域等结构性因素间的关系。他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创新与扩散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漫长的过程,需要结合多方面的因素进行研究,特别是在地理、经

济、社会习俗方面。这种研究理念为其日后所提出的“新文化史观”打下了相应的基础。

二、对社会背景认识的转变——从精神背景到社会互动结构

正是基于二者在研究理念的不同,双方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社会背景的认识也有所区别。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布克哈特分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在政治上分裂割据的原因“就意大利来说,教皇国的存在及其赖以继续维持下去的条件是意大利国家统一的永久障碍,似乎难望消除。所以,在15世纪的政治变革中,当共同的祖国这一名词有时被着重提出来时(如但丁、彼特拉克),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会引起其他一些意大利国家的烦恼的。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也即文艺复兴达到全盛时期的年代,对于爱国主义的复活是不利的;文学艺术乐趣的享受,生活的舒适和高雅以及对于自我发展的无上兴趣破坏了或阻碍了对于国家的热爱。”^{[1][138]}在这种情况下,布克哈特将当时意大利所存在的各城邦小国进行了归类分析,将其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种类型为专制型。这些专制“暴君”们大多出身贫寒,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为了巩固统治,争夺霸权,他们不择手段,同时也任人唯才,经常资助那些才华横溢的文化人和艺术家。第二种类型为近代的城邦共和国,如负有盛名的威尼斯与佛罗伦萨。这类城邦共和国社会活力较高,有助于人文主义思潮的成长与传播。第三种类型为教皇国。在教皇的神权统治下,整个社会生活腐化堕落。但教皇为了宣扬宗教权威,有时也会适当地任用贤人。如教皇尼古拉五世不惜重金重建罗马城,教皇利奥十世庇护拉斐尔,使其才华尽现,在一定程度上对宗教艺术的兴盛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由此布克哈特提出“在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开始充满具有个性的人物……上千的人物各自以其特别的形态和服装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但丁的伟大诗篇在欧洲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产生的。”^{[1][140]}简而言之,意大利独特而复杂的政治情况造就了半岛上国家和个人的“个性”,这种迥异于欧洲其他地区的政治特征为文艺复兴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但从总体上说,布克哈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社会背景的叙述还只是局限于政治层面,而且在探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产生的过程时,布克哈特往往更突出“精神背景”

的力量,而非物质因素。因此,在全书六个部分中,只有第一部分比较完整地涉及社会背景中有关上层建筑的内容,但这种描述往往仅限于对社会上层人物的刻画。

彼得·伯克的认识则更加系统,他从宗教组织、政治组织、社会结构、经济运行四个方面全面地剖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社会背景,充分展示了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并且提出了两个深刻的问题“意大利社会是真正开放的吗?它是属于市民阶层的吗?”伯克承认15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尤其是15世纪早期的佛罗伦萨,社会流动性是相对较高的,例如“乔万尼·安托尼奥·康帕诺从一个牧羊童变成了佩鲁加大学的一名教师,并被教皇庇护二世授予了主教之职……‘人文主义教皇’尼古拉五世虽是职业人士之子(医生之子),但其学生时代的生活也是穷困潦倒的;巴托罗梅奥·德拉·斯卡拉是磨坊主的儿子,后来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秘书长”。但是伯克认为,到了15世纪晚期,“各阶层之间的大门就被关闭了……这一时期新人进入贵族阶层的机微乎其微,就算有流动可能也是在低级阶层之间进行”^{[3][245]}。同时,虽然在十五十六世纪,意大利是当时欧洲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之一,但是“决不能认为所有的这些城市居民都是市民阶层”,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及其城市依靠的是当时人们所说的‘小民’,即‘劳动阶级’”^{[3][246]}。缘于这种认识,伯克认为,在文艺复兴发轫之初,这种对古典文化的复兴潮流最开始只是在城市的上流社会中流行,但是这些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们在创作新文化时,又不可避免地要取材于当时意大利民间社会中所广泛流行的某些传说、轶事、奇闻,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结合,故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综合体,具有双重性的特征。他指出“研究这一时期意大利文化的历史学家必须考虑……文艺复兴的各种表现形式和思想从精英阶层向普通民众的传播。”^{[5][142]}因为直到这种文化逐渐向不同地域、不同阶级扩散发展,呈现出多样性、大众性的表现时,这股潮流才逐渐被欧洲大多数人所接受和容纳。与布克哈特不同,伯克在分析文艺复兴产生的社会背景时,进一步从多个方面和角度阐释了文艺复兴文化的阶级属性和特征,不局限于研究上层社会中所流行的文

化,反而更加注重对大众文化的考察和探索,体现了新文化史研究中的普遍性和大众性,加强了传统文化史观中所缺失的对平民和低阶层人民文化生活的关注。

总之,在社会背景方面,伯克在布克哈特已有分析的基础之上,展现了一种新的互动结构,更加精确、深入地分析了意大利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文化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关系。他主张完整还原文化与社会互动的现象,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史研究中的诸多方面。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从实证主义到新史学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化史的核心是其辉煌灿烂的文学艺术,因而布克哈特在书中指出:文艺复兴之所以改变了欧洲人的精神面貌,能推动欧洲文化的进步,关键是因为当时的学者和艺术家在复兴古学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了二次创造,使其有机结合成了一个整体。这一认识别具一格,并逐渐成为后世文艺复兴文化史研究者的共识。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布克哈特搜集了当时许多原始资料,包括书信、手稿和文学作品,并注重对其进行梳理和考辨。在研究方法上,布克哈特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其导师兰克的治学理念和思想的影响,非常注重实证主义研究,对史料的来源十分重视并加以深刻分析。在论证表述其观点时,他引用了大量的具体事例来辅以证明,加深了其著作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然而,在研究过程中,布克哈特虽然一再声称“文化”绝对不属于黑格尔所提出的“绝对精神”,文化史研究突出的内容是历史事实,而绝非抽象认识。但正如本文上述所提到的,在进行总结概况时,布克哈特却又重新归纳出了一种“时代精神”。他认为这种“时代精神”是隐含在文艺复兴文化背后的主要因素,是驱动文艺复兴进行的关键力量,因而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唯心主义的范畴。这种矛盾也为后世史学家所诟病。

伯克在布克哈特认识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他首先承认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的再创造,同时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文化精英”出现的社会背景、艺术背景和社会地位十分感兴趣。他力图阐述诠释为什么文艺复兴会率先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中出现,为什么会在意大利产生如此多彪炳史册的艺术家。伯克所处的时代正值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的时期,他采用了当时风靡史界的“计量史学”的方法,利用计算

机技术搜集分析,通过数据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数百位最知名的雕塑家、画家及建筑师等代表人物,通过对比,将其受教育情况、专业训练及其作品产生的条件和环境,还有与其作品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分门别类进行归纳,并将之与当时意大利阶层结构的调整、审美观念和社会风气的转变相联系,得出了几个特别的结论。伯克认为,首先,出生地会影响一个人成为建筑家、作家或者画家的概率。根据伯克统计:“如果我们把意大利划分成7个地区,我们会发现约26%的精英来自托斯卡纳、23%来自威内托、18%来自教皇国、11%来自伦巴底、7%来自南意大利、1.5%来自皮埃蒙特、还有1%来自利古里亚……如果我们把这些数字与各地区人口进行比较,会发现其中有4个地区(依次为托斯卡纳、威内托、教皇国和伦巴底)产生了绝大部分艺术家和作家。”^{[3][45]}而且能否成为一名成功的艺术家或作家,不仅与他的出生地相关,甚至还与他所在社区的人口规模相关。根据作者统计:“在意大利,人口达到或超过1万的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13%,我们的精英有60%就来自于这些人。”^{[3][46]}伯克进一步指出,人口越多的城区产生艺术家的概率就会越高,而那些富产雕刻和建筑石材的地区则更容易产生雕刻家和工程师。“在伦巴底地区(10%的精英来自这里)的雕塑家和建筑师分别占同类精英总数22%和25%”,“伊萨亚·达·比萨就是来自出产白色大理石的比萨西海岸……而米开朗基罗就是交给那里一位石匠的妻子所哺育”。^{[3][47]}其次,意大利人相较于欧洲其他地区的人来说,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样有活力和创造力。那些大部分工作时间不在出生地的“外国人”才更易成为杰出的艺术家。因为这些“外国人”接受过不同的艺术背景的熏陶,较少受到本地传统文化的约束,积极并勇于创新。最后,与那些贵族及农民家庭出生的孩子相比,手艺人的儿子更易成为艺术家,因为“一个天赋出众但出身良好的孩子可能因为父母认为这些体力或‘机械性’职业有辱身份而无法成为画家或雕塑家”,而“农民家庭的男孩要成为艺术家或作家也很难,因为即便他们确实知道存在这些行业,也很难获得必要的训练”。^{[3][50]}伯克试图通过数据来证明,只有那些手艺人的后代才更容易继承其父辈的衣钵,进而完成在艺术和技术上的创新。“这一时期,虽然绝

大多数意大利人都是农业劳动者,但只有7位精英来自这一阶层……在其余的艺术家和作家中,有114位来自手艺人 and 小店主家庭,84位来自贵族家庭,48位是商人和职业人士之子。事实上,艺术家常常来自手艺人 and 小店主家庭,而作家则主要是贵族和职业人士之子。”^{[3][48]}

伯克利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列举了大量细致入微的数据和事例,详细说明了社会因素对艺术家成长和发展的的重要性。他注意到了社会存在的物质力量对艺术家成长所产生的影响,但其并没有走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史观,而是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文化及艺术的形成不单单由经济因素所决定,而是多因素合力的结果。他引入了社会学等理论,其文化史观包含了总体史观和多元史观的思想,并逐渐成为新文化史观的代表人物。在研究方法上,他还特别看重社会理论与历史学科的交互影响,重视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互动,认为多种学科之间的配合可以取长补短,有效弥补各自学科的不足:“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有机会使双方从不同类型的山头主义(parochialism)中解放出来。”^{[6][2]}之所以在过去史学界均未能借用社会理论,是因为“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间的误解主要是对于理论态度上的差异造成的”^{[6][2]}。因此,在叙述和研究意大利新文化产生的过程时,伯克既“关注的是多样性、争论和冲突,同时也注意传统的核心问题”^{[7][8]}。20世纪后半期以降,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也日渐加强,伯克敏锐地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他更加提倡文化史与邻近学科,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艺术学、经济学的交流配合,试图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建立起连接历史学科与不同社会学科之间的桥梁。恰如英国文化史学家丹尼尔·斯诺曼所评论的那样:“彼得·伯克一直是‘新历史’理念的强有力的推动者和提倡者,他致力于扩大历史研究中时间、地理、图像及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8]

与布克哈特相比,这种重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互作用,尤其重视社会学、经济学、艺术学在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方面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方法,更能突出展现文化与其周围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的复杂联系,加深了史学界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史的认识和思考。

四、对文艺复兴运动社会思想的再认识——从人生观到世界观的考察

布克哈特和伯克在各自作品中,都详细介绍和探讨了文艺复兴运动下意大利社会思想的演变。布克哈特认为“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部观察都一样——一直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半醒的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面纱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1][139]}布克哈特认为,文艺复兴对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文艺复兴催生了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反过来,人文主义进一步使人类及其社会思想认识到了自我的价值和无限可能。这种理论,实质上还是布克哈特有关“时代精神”论述的发扬和表现,即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是最能代表及引领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潮流和社会思想的“精神力量”。这些经典的论述一经提出,长期以来一直为文化史学界所推崇。但通过“计量史学”的大量数据对比,伯克却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他对布克哈特所认为的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思潮的盛行进行了质疑。伯克提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居民都强烈意识到他们作为家庭或团体的一员的角色”,家族的地位十分重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家族始终是城市社会生活的核心,家族成员之间对于他们的血统联系非常重视,他们往往抱成一团,患难与共,一起对付困难和危机。在一个家族里,个人任何重要的决定,如购置田产……都必须和父亲、叔伯、堂兄弟们商议并且取得他们的同意”^{[9][298]}伯克进一步阐述了“自我意识”和布克哈特所说的“自我肯定”的区别。他认为布克哈特所提出的个人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带有自我肯定的价值评价,离真正的自我意识的苏醒还有较远的距离,并不具备代表社会思想的能力。当然,伯克并没有否定文艺复兴时期自我意识已经开始萌生的这一事实。他通过搜集相关资料,例如传世的自传文学、绘画作品及礼仪手册等证据,准确

地证明了这一事实的存在,并对这种个人主义发展的程度及作用强弱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伯克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有所认识,但他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社会思想的展示,主要体现在对当时欧洲世界观而非人生观的考察中,这与布克哈特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伯克试图弱化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所带来的影响而突出世界观的进步。伯克认为,“个人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文艺复兴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迹可循,反而是世界观的进步值得重视。虽然当时相信巫术、魔法等一些中世纪时期的落后文化观念依旧在意大利社会中盛行,因为“大众文化属于文化原始主义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古代的、传统的和流行的东西都被等同起来”^{[10][33]},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这些观念并不妨碍意大利人在时间、空间认识上逐渐走向准确。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意大利社会的世界观才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并逐渐朝着理性与科学过渡,为后世的启蒙运动作了铺垫。相比于布克哈特,伯克对文艺复兴社会思想的研究更为进步,描绘了一个更为完整、立体、广阔的社会,深刻发掘了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的转变对整个欧洲社会全面的影响。

雅各布·布克哈特和彼得·伯克无疑是各自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史研究的领军学者。诚然,双方在相关学术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和分歧。例如伯克不承认布克哈特所赋予的文艺复兴运动的特殊性地位,认为布克哈特过分夸大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作用和影响,并试图解构布克哈特所建立的对文艺复兴运动的评价体系,将文艺复兴运动置于新史学的话语体系下。此外,两位学者在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传播模式及扩散路径等问题上也拥有不同的观点。毕竟二者在时代上相差百年,在不同背景、不同立场、不同语境下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甚至意见相左均为常事。彼得·伯克处于当代,正是人类社会飞速进步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都远超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科技的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跃升进一步打破了学科间的壁垒,使得文化史研究乃至历史学研究可以借鉴和吸收不同学科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彼得·伯克以新文化史观为指导,采用多种研究手段和技术,自布克哈

特之后再一次在当代新文化史的语境下建构文艺复兴文化史研究的新模式。与传统文化史观下的研究模式相比,伯克所倡导的新模式无论是从研究目的还是从研究视角上来说,都更为细致和全面,从而弥补了布克哈特研究中的诸多缺陷。从布克哈特到彼得·伯克,他们的研究所反映的不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史领域内的新突破,更是新文化史观与传统文化史观的相互交叉与冲击。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在诸多文化史研究领域内,二者的碰撞会愈加强烈。

注释:

①国外学界的主要代表作有 Richard · Sigurdson *Jacob Burckhardt'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4; Kahan · Alan · S, *Aristocratic Liberalism: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Jacob Burckhardt, John Stuart Mill, and Alexis de Tocquevil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德国学者卡尔·洛维特所著的《雅各布·布克哈特》(楚人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国内学界的主要代表作有朱孝远《论布克哈特的“人的发现”》(《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9年第8期)。

②国外学界的主要代表有 Felix · Gilbert, *History: Politics o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Ranke and Burckhard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波兰学者埃娃·多曼斯卡所编的《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国内学界的代表有崔陶梦《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艺术史研究方法论的理论溯源》(《大众文艺》2019年第14期);陈雅璐《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观》(《文化学刊》2011年第2期);刘耀春《雅各布·布克哈特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再思考》(《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③国外学界的主要代表有 John R · Hinde, *Jacob Burckhardt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Thomas Albert Howard,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Historicism: W. M. L. de Wette, Jacob Burckhardt, and 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Nineteenth-Century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国内学界的主要代表有曹意强《布克哈特文艺复兴观念与艺术史》(《新美术》2006年第2期);张盛健《布克哈特关于文艺复兴的观点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综合版,1993年第2期)。

④国内学界介绍彼得·伯克的成果主要有:刘日宏《彼得·伯克的文艺复兴观》(《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1期);武玉红《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念初探》(《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5期);蔡玉辉《彼得·伯克的文化史

观》(《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等。

参考文献:

- [1]〔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2]〔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M].王大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3]〔英〕彼得·伯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M].刘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 [4]Peter·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2014*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 [5]〔英〕彼得·伯克.文化史的风景[M].丰华琴,刘

艳译.杨豫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6]Peter·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5.
- [7]Peter·Burke.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M]. Cambridge, UK; Medford, MA: Polity Press, 2018.
- [8]Snowman·Daniel. Peter Burke [J]. *History Today*, 1999(49).
- [9]王挺之,刘耀春.欧洲文艺复兴史——城市与社会生活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10]Peter·Burke.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8.

【责任编辑 马毓】

From Jacob Bukhart to Peter Burke

——A Breakthrough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CUI Jin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Renaissance was a great ideological liberation movement from the middle of the 14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17th century, and it brought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to Europe that had been shrouded in theological shadow for a long time. As the source and important area of this movement, renowned cultural miracle happened in Italy, so the study of Italian Renaissance cultural history has long been a hot topic of Renaissance historical research. Jacob Buck Hart, a Swiss scholar, and Peter Burke, a British scholar, are undoubtedly two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in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Their representative works are the Culture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and the Culture and Society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respectively. The works of Peter Burke deepened 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Italian Renaissance historical study and compensated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Bukhart's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of research ideas and methods, Peter Burke made a breakthrough in the study of Italian Renaissance cultural history.

Key words: Italy; renaissance; culture; society; interaction